

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及其当代道路

——评李雪涛《思想断章》

■褚丽娟

日本学者佐藤慎一认为,“五四”以来中国出现两种知识分子,一为陈独秀类,一为陈寅恪类。陈独秀曾担任北大文科学长、教授,对他来说,知识分子意味着改变处于政治世界的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方式,这是常量,至于在什么领域实现其责任与使命,反倒是可变的函数。陈寅恪却以一人之独立意志,确立了另一种知识分子的范型。对于他而言,知识分子首先是学者,学者的工作不能混杂政治见解,应该按照学术自有的纯粹的学问逻辑和步骤行事。

其实,还有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。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李雪涛教授看来,中国现代学术其实有两种知识分子,一种是陈寅恪这样的,一种是胡适、梁启超这样的。陈寅恪一生只用古体文做学问,安身立命于学问世界。而胡适却在治学之余,倡导白话文运动,传播大众文化,开民智亦是其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。

若不是受到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启发,李雪涛新近出版的《思想断章》一书,或许还是被他搁置起来的“抽屉文学”。李雪涛走上学术道路时,正是一个剧烈转变的时代,在这激荡、热燥的转型时期,他的求学问道,烙下了鲜明的属性。对于学者的思考,读者看到的通常只是成篇、成册的学术著述。至于学问的底色、著述者的心路历程、思想的激烈碰撞、经历历史时刻的跌宕起伏等因素,是如何塑造了“这一位”学者,其过程则大多沉积

于冰山之下,鲜能被外界所知。《思想断章》一书则以一种杂糅了西方箴言体的中国古代小品文的形式,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学者思想帷幕的一角,展露了李雪涛30多年的心路历程。

虽为断章,然各章之间隐含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。李雪涛将内容分为“如是无闻”、“美与忧郁”、“时间-空间”“四海之内”“知识分子”“过眼烟云”“多层意义”“自我-他者”“生死之间”“历史记忆”等。这些主题或许不能囊括一位学者型知识分子在现世人生的全部内容,然而自西徂东的深刻体验,释史诗哲的糅合式沉思,辅以文人雅趣的底色,一幅当代中国学者的性灵和个性的情景就跃动在读者眼前。

20世纪,士大夫及其所代表的传统走进了历史,过去与现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。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多为“尤利西斯式”的流浪者,在文明的“荒原”既找不到可以回去的“家园”,亦未踏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甘于安守僵局。李雪涛一直在思索如何与断裂的传统建立联系,这种联系不是一种“乡愿式”复原的企图,而是一种“情境化”的“重构”。具体到知识分子个体对传统文脉的接续,他强调传统的审美、古典诗词歌赋的修养。19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考察完中国回到瑞典后,在书桌前完成《龙与洋鬼子》时,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的丧失感到无比担忧。这也正是李雪涛教授的担忧,在他看来,宋元山水的境界、含



蓄内敛的审美,理应是我们现代人“教养”的一部分。

李雪涛常常谈到,学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?做好学问,带好学生是也。至于做学问,他尤其推崇陈寅恪所说的学术研究的二原则:一是追求德国学者特有的Genauigkeit,即“精确性”;二是德国学者的Gründlichkeit,即“彻底性”。他是这一德国传统的践行者。在院里的新生欢迎会上,在给全校研究生的通开课上,在师门的沙龙上,在很多学术场合,他都在谈“精确性”和“彻底性”精神。在他看来,这两条原则不仅适用于学术研究,任何人在面对自己的职业时,都应该保持一种精确性和彻底性的职业精神。

在北外历史学院成立之际,全

球史研究院赶出了一份《三周年志庆》,在封底内页,李雪涛教授刻意放了一首歌德创作于1827年的《上帝和世界》,节选的中译文如下:

辽阔的世界,宏伟的人生/常年累月,真诚勤奋/常常周而复始,从不停顿//忠于守旧/而又乐于迎新/心情舒畅,目标纯正/啊,这样又会前进一程!

这浓郁的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,何尝不是李雪涛对学术的态度呢。学者需要清晰自己的使命,即马克思·韦伯所言之“以学术为志业”。大学的学术生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发狂的、毫无把握的冒险,韦伯要求所有想从事大学教师职业的人都应当有良好的心理准备,将学术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志业。李雪涛通过歌德这首诗,想表达的或许是只有那发自内心的对学问的献身。

李雪涛每日清晨6点来钟就来到了办公室,晚上10点准时离开办公室,周末节假日从来如此,即使春节若不是被家人召唤帮忙,他总在办公室埋头案几。自从成立了研究院,意味着这些时间常常被行政工作占用,他却很少抱怨。李雪涛对此有着自己的思考。他曾举例欧洲两所大学的某系,一所大学的系主任,经过十年多时间,自己著作等身,但系里的教授席位却从两个削减为一个,而另一所大学的系主任,经过十多年的发展,自己最大的成果依然还是教授论文,但系里的教授席位却从一个增加到了三个。他认为,作为一名学者,除

了学术之外,也要为自己的学院和学生做一些外围的工作,这些看似“浪费”时间的杂务,其实很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学术潜质。作为院长,当然有责任带领自己的团队获得发展,这其中付出的看似无谓的时间其实是很必要的。

这种执着,除了对学术持久的热爱、出任院长的担当,当然离不开来自德国传统的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。

但对一名学者来说,执着于学术事业的同时,亦需学会“放下”。尘世喧嚣和功名燥热无时不在冲击着每一个人,在《思想断章》中李雪涛记录了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。学者需要以清静眼看清楚知道人生中的诸多事诸多欲,哪些是可为,哪些是不可为,哪些绝不可为,这种界限亦是学者的底线。

李雪涛在大学读书期间,曾在广济寺阅藏。在德国波恩求学的2000多个日夜,宁静的小城是他研习佛经的理想之地。对他而言,莱茵河里粼粼的波光,就是洗净“热闹心”的那钵“冷泉水”。“举重不持重”,这种“放下”的智慧,让他以一种淡然温和的心态与这个世间的纷争、误解和苦难达成谅解。当下“佛系”遂成为一热门词汇,但实际上媒体所谈的“佛性”与佛之真谛大概是南辕北辙。李雪涛以其佛学研究的功底,诠释了一名当代“佛系学者”应该有的样子,除了学会放弃、获得自由的参悟之外,一定是饱含着浮士德式的精神:在自己感兴趣且有意义的领域不停地劳作。

有惊喜,也有遗憾

■乔丽华

有一次见到早稻田大学的千野拓政教授,我向他打听日本人对张爱玲是什么感觉,结果他回答我,日本人并不特别对张爱玲感兴趣,因为日本的作家也很擅长写日常生活,私小说很发达,所以反而对反映时代的中国作家更感兴趣。千野教授的话大意如此。我听后似有所悟:的确,日本学者在鲁迅研究及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,这里面更多地包含着想要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。而张爱玲的文学,在一般日本读者眼里恐怕就是普通的言情小说,更何况她的文字如此华美瑰丽,充满了重重叠叠的意象,翻译成日文怕也是不容易的。

池上贞子教授是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的,翻译了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《倾城之恋》《留情》三篇小说,在译介的过程中,她既折服于张爱玲百般锤炼的语言表达,同时也将张爱玲的创作视为“沦陷区文学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探讨,这本《张爱玲——爱·人生·文学》就是她研究张爱玲近20年成果的汇总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,大陆及港台的爱玲研究及资料挖掘已经非常深入,而池上贞子的这本书则让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翻译、研究进度及其不同于我们的一些观照角度。根据池上所

述,张爱玲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《赤地之恋》《秧歌》这两部中长篇小说,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翻译出版,都是由英文版翻译成日文的。此后直到1991年张爱玲的其他一些小说散文才陆续翻译成日文,但截至2010年,也没有小说集《传奇》和散文集《流言》完整的日译本。这也印证了千野拓政教授的说法——日本的读者对张爱玲曾经并不热心。

池上教授作为日本的研究者,关注的角度自然与我们稍有不同。例如在张爱玲的《双声》里记录了张爱玲和炎樱对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《星期五之花》的批评,书中第一章专门介绍了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,阿部知二在上海的活动,及阿部对炎樱与张爱玲的印象。可见,张爱玲在作品中提到这位作家并不是没有来由,而这恐怕很容易被中国的读者或研究者所忽略。针对张爱玲文学的时代性问题,池上一方面指出,张爱玲独立的文学立场使之免于跟汪伪政权产生更多瓜葛,但另一方面“她有一双看透人们在时代的大洪水中毫无办法的眼睛”,而张爱玲的小说也描写了在大时代中人们的生活状态。另外,作为女性研究者,池上对张爱玲的文本也有敏锐的发现,如她指出虽然张爱玲在《自

己的文章》中对傅雷的批评不以为然,她此后的写作却难免不受到影响而做了调整;早期“香港传奇”中对那些色彩绚丽的花草树木的描写,象征了张爱玲的青春时代;《留情》中米晶尧与淳于敦凤的感情,也隐隐透露了她与胡兰成的关系……这些都是很有创见的。

自然,读了这本张爱玲论后也不免感到一些遗憾。其一是没有能在书中看到关于张爱玲与日本之间的更多资料。例如张爱玲1952年11月曾赴日本,打算到日本谋发展,但1953年2月她又匆匆返回到香港。这短短的三个月她在中国是如何度过的?见过什么人?是否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影响?书中没有提及。池上虽然也提到张爱玲1978年发表的《浮花浪蕊》,但可能因为文字上的隔膜而没有能深入地解读,甚至有些误读,如认为小说描写洛贞在船上的见闻是基于张爱玲1942年从香港到上海的经历。其实小说呈现的时间是很明确的,应当就是基于张爱玲从香港到日本这一段海上旅程的体验。对日本学者而言,《浮花浪蕊》这样的作品无疑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取和解读。

其二则是翻译方面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。兹举数例:1、把《杂志》的主编袁殊



《张爱玲——爱·人生·文学》
[日]池上贞子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写成袁殊,袁殊是中共地下党员,抗战时期周旋于敌我多方,被称为“多面间谍”,据说前两年走红的电视剧《伪装者》就是以他和潘汉年为原型。把这样一个人物的名字写错,想来是翻译或校对不熟悉历史。2、文中有些地方明显不符合史实。如在《张爱玲与胡兰成》一章中说“张爱玲离开温州时他也萌生了分手的念头,但因他当时恰逢劫难,不欲增加负担,就没提出来。”根据胡兰成本人的记载,这是张爱玲绝交信中的话,是张爱玲考虑到胡兰成恰逢劫难,所以没有提出来。3、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解,如关于《留情》一章,说米先生嫌弃敦凤发胖“同坐一辆三轮车是不够漂亮的”,实际上《留情》中是写敦凤恨米先生上了年纪,跟她同坐一辆车是不够漂亮的……诸如此类的讹误无疑有损于原著的学术价值。作为“张迷”,不禁为这样一个中译本感到遗憾。